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朗宇法师 主编

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

李际宁 著

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宝庆讲寺丛书

中国佛教学者文集

主编 朗宇法师

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



佛教大藏经
研究论稿
李际宁 著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/李际宁著. —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7.8

(宝庆讲寺丛书·中国佛教学者文集/朗宇法师主编)

ISBN 978-7-80123-903-7

I. 佛… II. 李… III. 大藏经-研究-文集 IV. B94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133327 号

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

李际宁 著

出版发行: 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: 64095215(发行部) 64095210(编辑部)

策划组稿: 黄夏年

责任编辑: 戴晨京 张伟达

版式设计: 陶 静

印 刷: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125 印张 180 千字 56 幅图

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3000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23-903-7

定 价: 22.00 元

总 序

从佛法本身来说,教、理、行、证的修学次第,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。但是,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、喜好的不同,往往有所偏向,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,有重义理、重实践等区别。但是,作为佛弟子来说,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,充分、完整地表达出来,如“阿毗达磨”虽然着重于论证“法”的自性、定义、关系等,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“谛理的现观”,最终归于修证。那么,重修证的佛教,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,重视佛法的适应性、实效性,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,如初期大乘经典以“般若”、“三昧”、“解脱门”、





“陀罗尼”、“菩提心”等作为中心，来表达从发趣、修行、证入的历程。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，但都是佛法的根本，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。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，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，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。《高僧传》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，其中翻译、解义、读诵便属于义解门；而习禅、明律、感通、遗身、护法、兴福，都是属于实践门；最后一科“杂科”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，旁及世间经书、治世语言、礼乐文章等，无不兼通。

但是，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，主要是注疏经、律、论，在“述而不作”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，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。而且，这些佛教义解僧，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，通过注疏、论著，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。南北朝佛教的兴盛、隋唐佛教的辉煌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。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，重视主体的体认、自己身心的解脱、净土法门的流行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，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。但是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随着禅、净的流行，在这种“简单”、“不立文字”的潮流下，中国佛教徒逐渐失

去探讨高深佛理、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。于是，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。

另一方面，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。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，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。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，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。于是，通过接触梵文、巴利文等东方语言，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，消化佛教的教义。在“理性主义”、“科学主义”思想的影响下，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观性、纯学术性，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，于是佛教便成为一门学问——佛学。19世纪后期，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，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。随着“西学东渐”、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，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，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，如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楞严经》的辨伪，“大乘佛教非佛说”的讨论，“佛教非宗教非哲学”之辩等。同时，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，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“人生佛教”运动，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，其中以印顺法师





的成就最大。但是,相对来说,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,像吕澂、陈垣、汤用彤等,皆为一代学术大师。

改革开放后,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,经过二十年的努力,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、重塑佛像的工作,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、香火旺盛的现象。于是,培养人才、弘法、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。然而,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,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。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,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。

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,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,文献学、考据学、思想史、语言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,对佛教进行理性的分析,定性定量,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。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,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,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,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。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,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,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,显示其优胜之处。通过学术研究,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

清楚,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。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,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,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;同时,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,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,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,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。

因此,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,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,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、文物中,去伪存真,去粗取精,探索其前后延续,彼此关联的因果性;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,及其因时、因地的适应。以了解过去,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,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,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“人间佛教”思想,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“以文化阐扬佛法,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、本土化、现代化的权巧方便。”现代中国佛教界,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,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,通过转化与变通,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,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。





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(989),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。嘉定十五年(1222)宋宁宗赐名“宝庆讲寺”。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、尊重学术、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,一直讲法不辍。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,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《三字经》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《宝庆讲寺记》。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《宝庆寺观音殿记》。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,高高地耸立在寺里。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,在日常事务、早晚功课、坐禅念佛等之外,勤于读书,研究经论。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,参访名山大寺,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,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。因此无论到哪里,我都会带上一些书,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,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,已经蔚为大观,感到欣慰。但是,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,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,而且现有书籍之中,难免良莠不齐,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。有感于此,我和道坚法师、圣凯法师、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,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。于是,我们决定

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,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,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,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。

朗 宇

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



总
序

序

大藏经是基本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,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,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。它是佛教“佛、法、僧”三宝中“法宝”的代表。由于大藏经在佛教中占有崇高的地位,因此,在古代,围绕着大藏经,曾经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宗教活动乃至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;在今天,它不但依然是佛教界进行宗教活动的崇奉对象,而且成为学术界从事佛教研究的重要领域。

毋庸讳言,虽然大藏经研究是佛教研究的重要领域,但是,与佛教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,大藏经研究领域却显得相对冷清、寂寞。追究其原因,固然是多方面的。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探讨,我认为,大藏经需要的是实证性的研究。所谓“实证性



序



研究”，我个人理解应该包括两个方面：第一、从资料的角度讲，研究者除了需要掌握历代经录，收集整理散见于历代文献中的关于大藏经的各种纪录，收集前人在同一课题上的研究成果之外，更加重要的，还在于需要实地考察各种大藏经的经本。只有真正掌握经本，把经本放到历史的链条上，放入当时的背景中，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，然后才能得出庶几乎近之的结论。第二、从学风的角度讲，从事大藏经研究，要求研究者一定要严谨、细致、谨慎。学术界有一句话：“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，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。”我自己的教训是，搞大藏经研究，应该是有十分材料说八分话。有些问题，即使自以为已经掌握，最好还是先沉一沉，放它几年。因为也许还会出现新的情况。也就是说，所谓“实证性研究”，资料要“实”，学风要“实”。这就对大藏经研究者提出很高的要求。

本书是李际宁关于大藏经研究相关论文的结集。其中的论文，以前我大都看过。这次重新阅读全书，最大的感受，就是这的确是一本实实在在的学术著作。篇幅虽然不大，内容却很扎实。书中的资料是实实在在的，作者的学风是实实在在的。每

篇文章都言之有物,不同程度地提出了问题,解决了问题。

比如《〈金藏〉新资料考》一文指出,北图藏《磧砂藏》中的鲍善恢题记,实际来源于赵沅碑。亡佚已几百年的赵沅碑的内容,因为作者的努力而重现于世,这对于所有《赵城金藏》的研究者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。任继愈先生特意将这一成果写入《中华大藏经总目序言》。又如,对于被胡适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的《磧砂藏》,作者指出它为宋刻、元补、明递修;提出现存的《磧砂藏》除了少量的宋、元原印本外,大多为明代的递修印本。这一观点的提出,抓住了解决《磧砂藏》问题的症结。特别是作者在大藏经研究史上首次提出,研究大藏经不仅要研究它的系统与版片,而且要从收藏经版的寺院、负责刷印的经坊、请经供养的施主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去考察与把握不同藏经、相同藏经的不同印本的特点。这一观点的提出,不仅深化了大藏经研究的内涵,也为大藏经研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天地。收入本书的文章,有的曾经公开发表,有的曾经内部发表。现在看来,除了个别观点,因沿袭前人而致误,需要修订外,凡属作者自己提出的观点,至今依然





可信,依然站得住。从总体看,本书不但解决了不少以往大藏经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,纠正了以往一些错误的观点,而且提出了一些开拓性的课题。这是近年来大藏经研究的重要成果,为大藏经研究作了很好的学术积累。

作者能够在大藏经研究领域取得如此成绩,我想首先是作者充分利用了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工作的有利条件。从各种材料反映,中国古代刊刻的刻本藏经,至少有 20 多种。每种藏经刻成后印刷的数量,自然不少。但是,真正保留到现在的较为完整的刻本藏经,却如凤毛麟角。特别是宋元刻本藏经,东瀛日本多有保留,而在我们中国却极其罕有。这给中国的大藏经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。然而由于种种因缘,国家图书馆却收藏有《赵城金藏》、《思溪藏》、《磧砂藏》、《永乐南藏》等多部藏经,并收藏有不少其他藏经的零本。这为李际宁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此外,善本采访,有时会遇到古代藏经零本,这更逼着他必须去研究问题,解决问题。其次当然要归结为他本人的勤奋与努力。大藏经研究与其他古籍研究不同的是,一部大藏经,动辄数千卷,不从头到尾摸一遍,不可能有真正

的发言权。而把数千卷大藏经全部摸一遍,所费精力可想而知。如果想把每部藏经都从头到尾摸一遍,所费精力更非常人所能想象。此外,从本书可以看到,李际宁的不少论文充分利用了馆藏的资料,但并不仅仅局限在馆藏资料上。从东瀛到西域,有关资料都被收纳。实际上,了解李际宁的人都知道,他对大藏经研究资料收集之丰富,在国内屈指可数。他所收集的资料真正被本书利用的,只是很小的一部分,可谓厚积而薄发。正因为掌握了大量的资料,从事研究时才能做到胸有全局,游刃有余。第三应该提到的是作者踏实、谨慎的学风。本书的每篇论文,都是凭资料说话,而且不说无把握的话,不说过头的话。所以他提出的观点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。



序

本书也有不足之处。由于是论文的汇集,某些重要资料被多篇文章引用,这样从总体看,行文显得重复。虽说文以载道,达意即可,但还是应该注意行文的语法、逻辑与修辞。

与李际宁相交近 20 年,共同合作从事项目。多年来,他对我的工作,始终给予全力支持,甚至为了合作项目的正常开展而放弃个人已经承担的研



究项目,对此我深感歉疚。这次他要求我为本书写一篇序,我自然义不容辞。阅读本书,具体感受到十多年来,李际宁在大藏经研究领域是怎样踏踏实实地一步一步前进,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的。在此,为他已经取得的成绩深感高兴,并预祝他取得更大的成绩。

方广铝

2007年8月于通州皇木厂

目 录



总 序	(1)
-----------	-------

目

序	方广锡(1)
---------	----------

录

“崇宁万岁寺”或“崇宁万寿寺”考	(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《金藏》新资料考	(7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敦煌莫高窟北区 B53 窟出土汉文《华严经》	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

版本考	(34)
-----------	------

关于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木刻本佛经残片的	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

考察	(43)
----------	------

关于北京图书馆新发现的碛砂藏	(6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1